

##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30)

## 锻制文学的“金蔷薇”

□师力斌

作为一位实力派小说家,姚鄂梅的创作特点显而易见:注重讲故事,不搞叙事圈套;顺着人性这根藤蔓,将悲惨命运一捋到底,黑色阴影笼罩四野;把理想主义冲动和悲悯情怀深深埋藏,将现实的严酷呈现到不尽人情的地步;寓历史意识于小故事之中。

## 远离先锋,回归讲故事的传统

读过姚鄂梅小说的人都会发现,她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作家。姚鄂梅小说总以非同寻常故事情节来推动。比如《马吉》,中国农民遇见了外国姑娘,会发生什么事?这个悬念会迅速抓住你。《在王村》围绕一对从城里来乡下定居的夫妻展开,悬念重重。为什么不住城里?住乡下目的何在?这里的“讲故事”是通俗意义上的讲故事,而不是先锋实验意义上的。事实上,姚鄂梅远离先锋实验。在她的小说中,人物、事件、原因、结局都交代得非常清楚。但这并不等于她只讲故事,她将故事的容量扩展到相当深的层次。正如梁海所说:“她的小说往往悬念迭起,由一个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串联起来,一直通向狭长而幽深的结局。一个秘密套着另一个秘密,让我们迫不及待地读下去。”无须讳言,姚鄂梅小说有着通俗的属性,不挑战读者智商,但会震动你的心灵。这是一种相当难得的功夫。

姚鄂梅有很多作品常被提起,像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中篇小说《马吉》《穿铠甲的人》《黑眼睛》《黑键白键》,很少有人注意到《漫长的瞬间》这部中篇,小说异常精彩,描写老年人的生活,在故事性、节奏感、细节描绘、反映现实等方面都堪称精品。100多岁老太的死其实只有一瞬,然而,这个过程被无限延展,其中上演了种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老太躺在床上等死,孙子、重孙不顾她的尊严,围在床前大声争论的人群,到了老太的床边很自然地两边分开,留出一条小小的走道,让领导上前慰问。领导是个白白净净的大高个,只见他抢前一步,将老太的一只手捧在他硕大的掌心里。闪光灯刷刷地亮起来,屋里顿时像扯起了闪电。……这些段落显示了姚鄂梅对细节的把握能力,让她的小说有生活底气,具备经验上的公共性,不是官场小说而胜似官场小说。

《漫长的瞬间》只是姚鄂梅小说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无论是在艺术审美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姚鄂梅都是风格多样的。诗意充盈如《像天一样高》,想象大胆如《真相》,环环相扣如《户口往事》,扑朔迷离如《在王村》《讨债鬼》,哀婉低回如《穿铠甲的人》,她的小说所涉及的题材有关打工人命运的《大路朝天》《一线天》《大约在冬季》,有探讨仇富心理的《罪与囚》,有探讨复仇主题的《黑眼睛》,有涉及家庭教育的《黑键白键》《心理治疗师》,有反映老年生活的《狡猾的父亲》,有关乎社会阶层分化的《你们》,有饱含寓言性质和乌托邦色彩的小说《西门坡》,有探讨中西文化的《马吉》,还有思考女性命运和心理的《在人间》《隐形眼镜》《玫瑰》《辛丽华同学》等等。

可以说,姚鄂梅的小说风格、立场、题材、语言、结构等都是多种多样的,难以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惟有拿人生活的这把尺子最合适。姚鄂梅所有的小说都在探讨人性,执著而心无

姚鄂梅,湖北人。著有长篇小说《像天一样高》《雾落》《真相》《一面是金一面是铜》《西门坡》,中篇小说集《摘豆记》。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曾获2008年、2011年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12年人民文学石碣杯年度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妇女节的秘密》被评为《中篇小说选刊》2006—2007年度优秀作品。

## 挖掘人性黑暗的小说辩证法

姚鄂梅小说的主色调是黑暗,她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涉及人性黑暗或残缺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姚鄂梅是最清醒、“最冷酷”的作家之一。她的故事几乎全部是悲剧。没有一个爱情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格是高尚的,也没有一个结局是理想的。姚鄂梅果断地、无情地将光明的尾巴剪掉了。她没有给幸福、美好、温暖之类的想象留任何表演舞台,她拒绝平庸而肤浅的温暖和善良。或许,在姚鄂梅看来,温暖、善良、美好用来探讨深层人性过于浅显。生活惟其苦难,命运惟其多舛,人格惟其复杂,人性才具真实深刻。

《心肝宝贝》中,远秋为给自己的双胞胎儿子交重点中学择校费,不惜去狗市骗人。他往狗毛上涂色冒充斑点狗,被人识破。这种做法最终遭到儿子们的唾弃。“我比狗更可怜”,“养一个孩子不如去养一条狗?”这是《心肝宝贝》中最让人难受的话,但又何尝不是人性最隐秘处?《妇女节的秘密》中有言:“母亲是个妇产科医生。也许她一天看见了太多女人的下体,爱情在她眼里早就褪去了花里胡哨的衣衫,只剩下赤裸裸的本质。”“从她进入妇产医院那天起,她就觉得爱情是很可笑的东西,所有的爱情最终都要到她那里去解决,靠那些冰冷的器械去解决,女人在那里又羞又怕,冷汗直流,转瞬间又好了伤疤忘了痛。她觉得所谓爱情,其实就是做贼。”在小说中,爱情是如此遍体鳞伤。

姚鄂梅以普通人的视角,现实主义的方式,原生态的细节真实观察和理解人性,她不像王朔那样把崇高拉下水,也不像卫慧那样把爱情脱光,但她却更加全面彻底。她笔下的小人物就像我们身边的你我一样普通平凡、复杂难解。他们自私、狭隘、功利、虚荣、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母爱、亲情、友谊、团结、和睦,在她的小说中都面目可疑。她一个挨一个地探测这些人性的真相,一步一步地逼近道德的底线,结论却常常是令人绝望的。

有人说姚鄂梅的小说“读起来在心酸以后还是心酸”。这是确论。在她笔下,生活是一连串的悲剧,人性是悲剧叠加的产物,人活在悲剧和无奈之中。生活的琐碎、命运的曲折、爱情的虚幻、婚姻的功利、亲情的脆弱都成了岁月宝鉴,照出人性的另一面。《黑眼睛》中,阿玉夫妇与医生一家都是无辜的,但由于一次变故引发的一连串变故,双方被推向仇恨的狭路,善良人的邪恶被逼迫出来。姚鄂梅总是在悬崖边上俯视灵魂深渊,当她说出了人世的黑暗与人性的残缺,她就说出了善良与悲剧。这是姚鄂梅小说的辩证法。姚鄂梅发现了表达爱和悲悯异常沉重的方式,几乎需要将美好的事物消耗殆尽,美好与善良才能水落石出。

## 身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人性

姚鄂梅小说没有背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规律。她的一系列小说,从不同层面和角度透视了转型期中国的心灵悸动与精神创伤。如《户口往事》《马吉》《一只蚂蚁的现实》《一线天》《你们》《辛丽华同学》《像天一样高》等,分别涉及城乡户口差别、中西文化碰撞、市场经济转型、打工者遭遇、贫富阶层分化、个人在体制内命运的沉浮、诗人梦想的破灭等重大社会问题。《一只蚂蚁的现实》是典型的历史文本。一个中专毕业生和一个高中毕业生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所在的粮店的转制,正是中国转型的真实写照。“一夜之间,粮食部门也不景气了,先是买粮不再凭本子,接着就是粮

在文学史上,乡土写作是一个既“旧”又“新”的话题。

说它“旧”,是指自农耕文明以来,乡土就在文学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从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诗经》中就可以看出,乡土几乎成了文学之“魂”。现在被广泛提及的农民、农村、农业之“三农”题材,不但得到了广泛地表现,而且还有力地开拓了后来地方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如果再涉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农耕文化及其孕育的乡土文学,也大抵如此。可以说,由于人类与土地与生俱来的亲缘性,文学创作总是不自觉地植植了乡土的基因和血脉,无数作家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力;也正是在这片丰饶的沃土上,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名家大师联袂而出并铸就了世界文学乃至人类文明史的脊梁。

从法国米斯特拉尔“忠实地反应了自然景色及其人民的乡土感情”到彭托皮丹通过《乐土》和《幸福的比尔》对当时丹麦生活的忠实描绘;从美国赛珍珠“对中国农村生活所做的丰富而生动的史诗般的描述”到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世系”,从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迟子建的“北国”和台湾的“鹿港”,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文学的“福地”。

对于文学而言,乡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和永恒的诱惑?千百年来,为什么会那么深刻地蛊惑着、召唤着多少游子那疲惫却又执著的灵魂?为什么会产生那些难于明言、无法理清、藤蔓缠结、撕扯不断的精神纠葛?对此,许多诗人都做了多方面的描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艾青);“没有这,还有什么值得做的事呢?”(卡罗尔·阿内特)

显然,作家对乡土的这种眷恋与皈依,首先源于他们与土地的血缘亲情。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土地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凭借,更是生命的本体构成;在一生的生活与

店不再是国家的专利,一些家庭开始蠢蠢欲动地试着开私人粮店。”粮店从国营到个人承包,再到“我的丈夫”开饭店,这个过程恰恰对应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

关注打工姐妹这一特殊社会人群的心灵状况是姚鄂梅创作的重要方面。她不是从问题小说的角度切入,而是从人性、心灵和姐妹的切身体验来切入的。《大路朝天》呈现了打工者恶劣的生存环境:“我们全都染上了头晕恶心的毛病……是蚊香熏的……蚊香架成了随处可见的小摆设,每张床头都摆着一个,一到夜里,十个蚊香一起燃烧起来,袅袅娜娜,十分壮观。”《大约在冬季》无情地抛弃了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老套,堵死了杜拉拉式的升职幻想。一个底层女性在陌生的城市,无奈无靠,无立锥之地,更无尊严可讲。她不得不与男性同睡一屋,甚至被他当成自己的老婆:“李默穿得严严实实地躺在一头,小萨穿着裤衩躺在另一头……睁眼一看,小萨正闭着眼睛压在我身上。”

在这些作品中,我仿佛看到了《骆驼祥子》《包身工》的影子。李默的遭遇成为千千万万打工者的缩影,这或许是世纪之交中国的一个侧影,也是最为灰色的侧影。她的名字叫李默。姚鄂梅甚至将《大约在冬季》《玫瑰》《黑色》《婚纱》几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都叫做李默——沉默,或者沉默的大多数。这个名字表征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是无名的,他们被遮挡在城市的角落、工地、车间。他们以前的名字可能叫李欢、李乐,如《玫瑰》中的两姐妹。显然,她们是另一个作者,或者作者精神上的姐妹。姚鄂梅没有局限于做一个打工问题小说家。她不是文学研究会意义上的作家,不是为人的作家,而是为人性学的作家。她不写官场,不写商场,连情场都不写,只写心灵黑暗的场域。

姚鄂梅将一篇小说命名为《心理治疗师》。而实际上,小说探讨的是子女教育问题。但这能够表明她的文学抱负。《罪与囚》也是这样,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聪明的、公认的好学生易清,怒杀同室的富二代同学古铜。不是由于深仇大恨,而是由于他看不惯富二代子弟的骄纵与跋扈。这个故事不能不让我想到目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便是文学的魅力。

## 超越悲观的现实主义者

不过,姚鄂梅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在市场价值冲击一切的情形下,姚鄂梅顽强地、执拗地保留了乌托邦冲动。这从她的两部长篇《像天一样高》《西门坡》和中篇《穿铠甲的人》等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点。这几个文本与前述那些众多的文本一起构成了她创作的两极——现实与理想。虽然《穿铠甲的人》中的“文学青年”杨青春终生困顿,但他的文学梦想、他的纯真的感情,像一副脆弱的铠甲将他与世俗区分开来。同样,《像天一样高》强烈的理想主义打动了。这部名为“献给80年代”的长篇,力图呈现当代都市人逃离世俗的冲动。以诗人康赛为核心的小团体的桃花源试验以失败告终,这符合姚鄂梅将悲惨进行到底的原则,但这个文本最令人心动的是那种现代桃花源的理想主义冲动,是诗人康赛坚守的树林诗歌。《西门坡》的理想主义实验性质更加明显。所谓西门坡就是一个专门收留不幸女人的女性乌托邦小社会,过着类似公有制的集体生活,基本生活条件由集体提供,个人没有财产。像诗人康赛的桃花源一样,西门坡最终破产了。西门坡带有寓言性,以浪漫的理想主义开始,以悲观的现实主义结束。

理想主义也好,现实主义也好,姚鄂梅都是放在人性这一框架内来观察与展开的,她的所有作品都是如此,通过对人性点点滴滴的收集来锻制文学的金蔷薇。这是她自己的话:“我至今还十分喜欢许多年前读过的《金蔷薇》,‘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目光和流盼,每一个深遂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翔,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寻觅它们,不知不觉地收集起来,熔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来锻成自己的金蔷薇——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或者长诗。”

## ■评论

## 乡土文学的“土”与“洋”

□唐浩明

《一湾星月》《那那月》在內的《乡土衡阳》丛书,以“写衡阳”或“在衡阳写”的方式,不仅精彩地诠释了衡阳乡土创作的新成就,而且还从现实主义、底层诗学和文学人生等多方面展现了乡土的写作哲学,让我们从浩瀚的文学史版图,重新认知乡土文学写作的立场、导向、趋势,以及乡土写作的活力与未来。

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乡土衡阳》丛书的出现既是必然的,又具有另外别致的风格。无论是作为一座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还是作为一块与人类文明源远流长的热土,衡阳都具有太多值得抒写的内涵。事实上,千百年来,在衡阳绵延不绝的文化史上,许多人前赴后继,铁血书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文史传奇,无论是蔡伦、王夫之,还是客居衡阳的周敦颐与杜甫;无论是晚清的中兴大臣曾国藩与彭玉麟,还是早已名声在外的琼瑶与龙应台等人,以及旅居海外并取得了文学盛誉的“诗魔”洛夫等,都当之无愧地贡献了湖湘文化最为炫目的华章,而且“根”系始终就在“蓝墨水的上游”——衡阳。

与他们的反复吟诵相比,还有一批默默地栖身在这片土地上、甚至与之合二为一的人们,也以同样燃烧的激情和血性,深刻地写着乡土的文脉;他们的名气虽然不如这些作家那么响亮,然而要真正地了解衡阳,他们的作品却是最为直接的文本。他们原生态地记录了衡阳的呼吸、心跳和历史中的点点滴滴,无论岁月如何风云变幻,总是给我们留下真正的衡阳味道、情感、期待、纠结、思考等诸多复杂的印记。意大利著名建筑师阿尔多·罗西曾这

## ■创作谈

越来越喜欢在有目标的人流中疾走,浑身发热地拖地、洗澡以及各种无需动脑的家务,手上有活,意识才能趁机出来四处闲逛,这种状态让我想起残雪曾经说过的话,有段时间,她最理想的工作竟是去烧锅炉,我想她喜欢的应该用低技术含量的劳动来筑一道篱笆,以保护她的自由意识不受打扰。

一直以来,我这样想象一个作家的生活:拥有一间安静的书房,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固定的阅读时间、固定的散步时间、固定的闲聊时间。但这样的生活对我来说,恐怕是一个终身的梦想。我干过很多种工作,出纳、文秘、行政助理,在那段漫长的时间里,我隐隐期望着能有一份类似烧锅炉的工作。后来,工作的担子轻了些,家庭事务又不容商量地占据了绝大部分精力。没办法,只好“顺应天命”,把某些机械性的事务变成“烧锅炉”。我为此准备了几个小本子,分别放在我的包里、厨房里、卫生间里,以便随时擦干净手指,记下那些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其实我后来很少去翻阅那些小本子,因为凡是我用笔记过的东西,基本上都不会忘,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了一些这样的小本子,一来可以预防我的记忆系统某一天毫无防备地失灵,二来可以安慰自己,毕竟在庸碌琐碎中还有一道微小而闪亮的闪电划过。

我把这些记录本称作密码本,对我来说,一个密码意味着一个短篇,或者一个中篇。在写《狡猾的父亲》之前,我在小本子上写过这样一句:父亲通身雪白、仙风道骨地站在我面前。这句话后来变成了这个短篇的开头,有了这句话,后面就像搭积木一样,永远不愁没有尺寸合适的句子出现在需要的地方。我甚至用这种办法写长篇,写《白话雾落》时,我记过这样一个情景,一个孩子拿着地图向他的老师提问:书上说总长江像一条巨龙,我怎么觉得长江像一条蜈蚣呢?当然,对一个长篇来说,这样的记录得几十上百条。写到中间,曾一度受阻,但有一天,我经过一家玻璃店,几个工人抬着一块很大的玻璃往外走,太阳折射出来的光芒刺伤了我的眼睛,我顿时豁然开朗,这块玻璃帮我打通了阻碍,迎来了转机,主人公历经艰辛竖在山顶上的巨大玻璃,给长年浓雾缭绕的雾落带来了光明和热能。

看着这些密码本,不禁想起母亲的针线筐。从我记事到母亲辞世,她一直都在用心维护、经营着她的针线筐,那里面分门别类放着她的宝贝:扣子、棉线、布头、贴片、各种小工具、旧衣服上剪下来的某个值得重复利用的部分,在特别的机会里得到的意外惊喜,端的是五花八门、生机勃勃。有时,她结束一天的工作,洗过手,端出她的筐子,略加思考,就开始行动,拿点东西、抽点那个,一样一样摆在小桌子上,端详、拼凑,再端详、修改、继续拼凑,这时候,她神情紧张而欢快,如处无人之境。几天过后,一件别致的衣服,或者一双新鞋,就从那些看似杂乱的针线筐里塞门出状元般脱颖而出。

我如今所做的与她当年并无太大区别,无非是收集、整理、裁剪、拼凑,历经数度修改,终于成形,欣欣然几天过后,再投入下一个过程。在母亲去世前的最后几年,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在同一张桌子旁坐着,母亲鼻尖上挂着老花镜,从针线筐里一样一样取出她需要的材料,摊在膝头,聚精会神地制作她的新品,我则对着电脑,沿着小本子上记录的密码,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摸索着前行。我们各干各的,互不干扰,连眼角的余光里都没有对方。那是我和我母亲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也是我和母亲各自的幸福时光。

当我试图整理那些用过的记录本时,才发现它们是那样残破,简直惨不忍睹,像牙齿不好的人吐出一大堆鱼刺。销毁的过程更是让人心悸,它们不像牙齿、不像头头,也不像指甲,即便功成身退,全身仍然布满神经,它们用痛感提醒我,那些属于它们的永远无法预测的诞生时刻,那些生命中分泌出黄金的时刻,是多么值得尊重和纪念。

以前,我喜欢各种创新,用新的形式讲一个老故事,现在,我喜欢用简单而有意味的语言讲一个新故事。以前,我无惧写到任何一种人,男女老少,皆可入“药”,现在,我喜欢写女人,写了女人,便是写了所有人,再没有哪种人像女人那样,身上铭刻着一切过往的人和事,我还喜欢写无爱的女人,她们孤独而尖锐,内心卑微得要命,一段童声清唱便足以让她们泪花滚滚。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些笨女人做的傻事”。选择没有疆界,但喜欢小如豆粒,细若游丝,我希望这样的写作把我和别人区别开来,就像当年母亲所做的女红,一望而知跟别人迥然有异一样。

## 冬筱：从前辈那里汲取营养

□王昉

日前,“紫金·人民文学之星”评奖在京举行终评会议,一部以“七月诗派”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受到关注,这就是由“90后”作家冬筱创作的《流放七月》。小说以“七月诗派”和“胡风案”为历史背景,演绎了“七月诗人”与其子、孙三代人之间的命运与情感纠葛,进而发出对个体与历史存在的多重拷问。

一个年轻的写作者为何对这一题材情有独钟?这就不能不提及对冬筱影响深远的祖父——“七月诗派”中健在的诗人冀荻。作为“七月诗人”的后代,冬筱格外珍惜这笔文学财富,他说,毕竟了解“七月诗人”的人越来越少,写作这本小说也是对诗人 and 这个诗派的一种安慰。据冬筱介绍,冀荻已年逾90高龄,患有心脏病,住院10年,但意识清醒,一直关心着孙子的这部小说,让人欣慰的是,老诗人终于见到了这部小说的出炉。

谈及爷爷,冬筱言语之间流露出真挚的情感,他说:“我很爱他,我希望爷爷永远不要离开我。”正是从对爷爷的挚爱中延伸出了冬筱对历史的凝望。在谈及对“七月诗人”的印象时,他说,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1980年后,白发苍苍的他们依然是好朋友,和从前一样时常聚会,一同出行,交流思想,彼此关心——他们真正成为了一个“集团”,而他们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也愈加显得悲壮而丰满。

谈及“七月诗人”以及像“七月诗人”这样的左翼作家对年轻人的影响时,冬筱说:“他们教给我们怎样面对苦难,遵从内心深处的信念,并且对生活保留真诚的激情和尊严。”正是从前辈作家的精神信念所感染,使得冬筱对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也有着深刻体悟。他说:“当历史走到今天,小说作家的责任也发生了改变,他们有责任保留属于我们先人的、近乎被遗忘的、亲密的生活方式的回忆。我幸运地拥有了证明自己机会,得到了前辈的帮助,并且试图展现另一种思考方式。如果一个年轻作者愿意去书写中国的历史,那他就有责任弄清清楚历史事实,进行有深度的反思并且关注这个国家的未来。”

如今,在“80后”、“90后”青年作家常常陷入“小我”的重重包围,缺少对现实、历史、民族的担当时,冬筱创作中的历史意识或许能为青年写作提供另一种思路。正如作家张抗抗所说:“《流放七月》以年轻人的眼光,写出了历史和当下、时代与个人的错综关系,它也许与你有关、和你的亲友有关。”

## 记录本·女红·写作

□姚鄂梅